

困顿与抉择

毛 军 金万成 著



東北大學出版社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近代中国历史走向

困顿与抉择

毛 军 金万成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 沈 阳 ·

© 毛军 金万成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困顿与抉择/毛军 金万成著.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517-0707-7

I. ①困… II. ①毛… ②金…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0485 号



出版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 111 号

邮编: 110819

电话: 024—83680267 (社务室) 83687331 (市场部)

传真: 024—83680265 (办公室) 83680178 (出版部)

网址: <http://www.neupress.com>

E-mail: neuph@neupress.com

印刷者: 廊坊市文峰档案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2.25

字 数: 31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策划编辑: 石玉玲

责任编辑: 郎 坤 王艺霏

责任校对: 刘珏元 曹 壮 潘佳宁

封面设计: 王宇彤

责任出版: 唐敏志

ISBN 978-7-5517-0707-7

定 价: 63.00 元

目 录

引言：观念决定道路，道路决定胜败 / 1

第一章 西力东渐 / 7

文明的“拐点” / 8

海上丝路 / 13

5000: 90 万 / 17

第二章 惯性模式 / 24

借助“洋上帝” / 24

圣库“不圣” / 30

天父杀天兄 / 35

湘军的崛起 / 40

第三章 旧瓶装新酒 / 45

师夷之争 / 45

“长技”之路 / 49

旧瓶与新酒 / 54

第四章 犹抱琵琶半遮面 / 61

“布衣之人”康有为 / 61

帝党后党之争 / 70

自上而下的路径 / 77

不同结局的两种维新 / 82

菜市口断想 / 86

第五章 对症的药才是好药 / 90

武昌枪声 / 91

开启共和 / 95
政党政治的幻灭 / 99
短命的复辟狂潮 / 109
新思潮的“发动机” / 115

第六章 斜阳下的十字路口 / 120

青年先锋 / 120
以俄为师 / 124
作始也简 / 129
初试锋芒 / 139

第七章 从合作到对抗 / 147

孙中山的困惑 / 148
共产党的“两难” / 151
迷茫中前行 / 157
风云突变 / 168

第八章 星星之火 / 178

“不是请客吃饭” / 178
井冈风波 / 186
围而不能“剿” / 195
“三人团” / 198

第九章 远征难 / 207

渡湘江 / 207
遵义会议 / 214
铁索寒 / 220
三军会师 / 225

第十章 多米诺骨牌 / 232

蒋介石的无奈 / 233
中共的调整 / 239
14 年与 8 年 / 243
倒下去的“第一牌” / 249

第十一章 中国战场 / 259

正面战场 / 259

有游有击 / 272

南进，南进 / 280

无条件投降？ / 286

第十二章 不可逆转的结局 / 293

蒋介石与毛泽东“掰腕” / 294

争夺东北 / 299

决战淮海 / 303

逐鹿平津 / 306

国民党退守台湾 / 308

第十三章 红色的幽灵 / 314

预言 / 315

卡夫丁峡谷 / 318

“苏联式”卡夫丁峡谷 / 320

“迂回政策”的尝试 / 323

令人深思的政治遗嘱 / 325

第十四章 “中国式”卡夫丁峡谷 / 327

走出苏联的“阴影” / 327

既不是“两次”，也不是“一次” / 335

后记 / 348

引言：

观念决定道路，道路决定胜败

百年近代历史，波澜壮阔，纷繁复杂。有学者认为，百年近代历史是“阶梯式的”“革命高潮”过程，也有学者认为是“近代化”的过程，还有学者提出是“救亡与启蒙”的过程。本书认为，百年近代历史是“困顿与抉择”的过程。

近代中国社会的困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封建专制制度在其自身运行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落后性和不可避免的终结性带来的困顿；二是东西方文明的撞击，古老文明的陨落，西方殖民扩张带来的困顿。

大清帝国历经短暂的“康乾盛世”后，吏治腐败，经济低迷，军备废弛，文化黯淡，民不聊生。面对综合实力的急转直下，如火如荼的起义暴动，如何巩固现有的政治体制，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最大问题。

步入近代，东西方文明的巨大落差，古老东方文明的陨落，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已成定势，在所难免。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这样评价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英国的大炮

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伴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困顿逐渐加剧，抉择愈加迫切。近代中国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一轮又一轮过山车式的抉择。

当我们把太平天国运动放到近代世界发展趋势和潮流中进行审视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太平天国运动没有跳出以往改朝换代的“惯性思维模式”，缺少“近代意义的新元素”。

西方的船坚炮利，震醒了睡梦中的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状态下的“天朝大国”在半梦半醒之中，开始了“第一次近代化抉择”的洋务运动。

我们不应苛求，也不应该耿耿于怀于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中体”基础上的洋务“西学”，是近代中国面向西方抉择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必然阶段。要求洋务派在向西方学习的起步阶段，就能提出“西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种奢望，是一种历史的虚无。

“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万马齐喑”的大清帝国犹如一束耀眼的火炬，照亮了后人前进的道路。然而，洋务运动的“西用”最终没有完成对“中体”的吞噬和“致命一击”，洋务的星火，没有形成奋起直追的燎原之势。

抉择的过程是一个逻辑的链条。洋务运动开创了“西用”，戊戌变法迈出了“中体”改造的“第一步”。西方社会的启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中国社会的启蒙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下，难以从容。西方殖民扩张的压迫，令中国的启蒙不能不伴着“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能不伴着民族情绪的高涨，不能不更多地表现为救亡图存。戊戌年间的“变法”，更多的不是基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解，

而是迫于救亡图存的需要。

戊戌变法开启了“制度层面”抉择的闸门。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本应是某种逻辑的“传承”，而不应当表现为“水火不容”。可惜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并不是从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中“蜕变”而来的。变法，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在叶赫那拉氏与光绪的角逐中，在后党与帝党的权力纷争中，毫无权术经验、布衣出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自然无法把握维新运动的走势。戊戌变法仅存 103 天便宣告夭折，也就不难理解。

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次“遮遮掩掩式”的抉择，辛亥革命则是一次“决裂式”的抉择。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将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的皇权政治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男女平等、天下为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政党政治这些“近代名词”，随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鲜血液，开始注入中国社会。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彪炳史册。

如果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从根本上动摇了大清帝国，真正实施对清王朝“致命最后一击”的却是掌握北洋军政大权的袁世凯。与其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如说是孙中山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宝座“让位”于实力强劲的北洋军阀。

皇权政治被结果了，但围绕着权力的争斗、军阀间的混战依然持续。袁世凯复辟、二次革命、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护法运动、新文化运动……抉择的指针总在不断地摇摆，困顿中的人们看不到正确抉择的曙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陷入困顿中的人们提供了抉择的新思路。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国共合作使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脱胎换骨”，国共联手打败了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似乎出现了一次“新机遇”。国民党立足“三民主义救中国”，共产党立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国共分裂的具体原因看似扑朔迷离，偶然之中包含着必

然。

目标的抉择，也是路径的抉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效仿苏联城市暴动的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内“不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相继失败，实际上宣告了苏联模式的破灭。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使人们逐步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形成燎原之势的曙光。共产党人的实践反复证明：“中国的革命，需要由了解中国的同志领导。”“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路径模式的抉择，共产党人前前后后整整探索了十四年，付出了包括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内的沉重代价。路径的抉择之所以出现反复和震荡，不仅仅是因为苏联“城市路径”成功经验所产生的强大的示范效应，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具有的艰辛。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国民政府试图把日本的侵略局限在“东北一隅”，采取“提交国联”的“软弱外交”。蒋介石抓紧时间“安内”，试图全力“剿灭”共产党。

回首81年前的那场战争，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八年，而是从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十四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之所以没有能够掀起“全民族的抗战”，完全是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态度的结果。蒋介石陷入失去民心的泥潭由九一八事变开始，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国民政府必然失去民心，这也注定了他与毛泽东之间“掰腕”的结果。

日本对中国的步步侵略，打破了远东固有的政治格局，也使得中国国内政治得以重新布局。在国内、国际的巨大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以正面战场抗击日本。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的确给日本以巨大的打击和牵制，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国共两党曾经由合作到破裂，国民党始终把共产党看成

“心腹之患”，“攘外必先安内”的逻辑思维严重影响了国民党全力抗日，严重阻碍了全民族抗日氛围的高涨。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美两大阵营合作中交织着激烈斗争的状况，同样影响到国共两党。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面临着不同的境遇，提出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各种政治势力在博弈中合作，在合作中博弈，力量此消彼长，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三年的解放战争既是国共两党政治分歧的必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格局发展的必然。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惊心动魄，波澜壮阔。蒋介石退守台湾，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生产水平落后的国家能否建立社会主义，这一“卡夫丁峡谷”难题，曾一度困扰着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同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如何建立社会主义，这一中国式“卡夫丁峡谷”难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

历史留给人们很多的“谜”，揭穿“谜底”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时间。面对书写的历史，人们可能无数次地追问：什么是历史的真实？什么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永远不可能复原。历史的价值更多的不在于追问它的真实与否，而在于以什么样的基点和视角解读。这或许是历史所以成为历史，历史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的全部所在。

百年近代史，在困顿中一次次地抉择，在一次次的抉择后，又产生诸多新的困顿。困顿与抉择的交织与交替，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百年近代历史的壮丽画卷。

1840年，是一段历史的结束。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撞击，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碰撞，使积淀了千年的“东方神话”轰然崩塌，留给人们的是“世纪的困顿”。

1840年，是一段历史的开始。“世纪的困顿”开启了“世纪的抉择”。“世纪的抉择”留给我们大多是思索：扑朔迷离的太平天国、灰飞烟灭的洋务运动、短命夭折的百日维新、波澜起伏的辛亥革命、摇摆不定的国民党、苦难辉煌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

困顿期待抉择，抉择注解困顿。

第一章 西力东渐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与发源于尼罗河中下游的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古巴比伦文明，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

唐宋之际，中华文明屹立世界文明巅峰，一览众山小。

在步入近代社会之前，世界文明流向的总趋势是，由东向西传播，东学西渐。古老的中华文明通过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弯曲丝路，伴着阵阵的沙漠驼铃，光耀西方。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工业文明迅速崛起，世界文明流向的总趋势发生了逆转——由西向东，西学东渐。

西力东渐不再是沿着弯曲的丝路，也不再伴有悦耳的驼铃，而是通过开辟的新航路，伴着血与火，伴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伴着殖民奴役和殖民侵略。

在东西方文明的畸形碰撞中，古老的东方文明黯然失色，“亚细

亚”的太阳开始陨落。

文明的“拐点”

古代农业文明源于东方，这时候世界文明的重心在东方。近代工业文明发端于西方，这时候世界文明的重心在西方。东西方文明巨大落差的拐点，出现在近代西方产业革命的兴起。

近代西方文明，伴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乘滚滚而来的产业浪潮，科学技术异军突起。古老的东方文明，依旧在农耕文明的轨道上“蠕动”，依旧呈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式的轮回，吟唱着“悠然见南山”式的田园牧歌。源于英国、席卷欧洲的产业革命，不仅彻底改变了西方，也颠覆了千年世界文明的基本格局。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曼彻斯特。曼彻斯特是英国第二大城市，从14世纪开始就成为英国羊毛和亚麻的集散地。曼彻斯特生产的呢绒、毡帽和粗棉布等纺织品，热销英国和欧洲各地。

1700年，英国议会颁布了一道贸易保护法令，法令规定：严格禁止从印度、波斯、中国等地进口印花布。受到贸易保护政策利好的刺激，一时间英国棉布市场的需求量激增。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工场主们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开始绞尽脑汁地提高棉布的产量。

梭子，是织布中的一个关键环节。通常，在操作织布机上的梭子时需要两个人相互配合。一个叫约翰·凯伊的钟表匠偶然间发明了飞梭。飞梭借助了一条特制的绳索带动织梭，织工拉动绳索，使梭子来回飞越梭道，一个人就能操控织布机。

飞梭出现后不久，一名叫哈格里夫斯的纺织工在回家推门时不小心撞翻了妻子正在使用的纺纱机。当他弯下腰来，准备把撞倒的纺纱机扶起来的时候，却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从来都是横着旋转的纱锭，由于纺纱机被撞倒，现在都变成了竖立式旋转。哈格里夫斯由此受到启发，研制出了用一个纺轮带动8个竖直纱锭的新式纺纱机，纺纱效

率一下子提高了8倍。兴奋异常的哈格里夫斯用自己女儿的名字来命名这部新型纺纱机，叫“珍妮纺纱机”。

纺织童工克隆普顿将“珍妮纺纱机”改造成以水力为动力的“骡机”，使纺纱的速度比原来提高了近100倍。织布速度与纺纱速度出现的你追我赶的局面，成为英国工业革命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牌”。

如果说纺织业的变化是工业革命前的一场“热身”，蒸汽机的广泛运用则吹响了工业革命前进的号角。

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源于一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修理工——瓦特。瓦特，早年因贫穷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很早就开始在父亲做工的工厂里做学徒。在这里，瓦特开始接触了一些机械，并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机械修理的手艺，瓦特被格拉斯哥大学聘用，在大学里做起了教学仪器修理工。

格拉斯哥大学浓厚的研究氛围深深感染了瓦特，他白天利用闲暇时间旁听教授们讲解的机械制造原理课程，夜晚在罗宾逊教授的引导下，开始尝试对蒸汽机进行改良实验。

经过刻苦钻研，瓦特研制出从两边推动活塞的双动蒸汽机。这种蒸汽机被称为“万能的原动机”，很快在生产中被广泛应用。

蒸汽机的出现，开辟了人类利用能源的新时代。后人为了纪念瓦特，将功率的单位称为“瓦特”，用符号“W”表示。

瓦特逝世后，人们对他发明的蒸汽机做了这样的评价：“蒸汽机武装了人类，使虚弱无力的双手变得力大无穷，健全了人类的大脑以处理一切难题。为机械动力在未来创造奇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将有助于并报偿后代的劳动。”

工程师斯蒂芬孙将蒸汽机用于铁路运输，研制出了火车机车。斯蒂芬孙开动着“旅行者”号蒸汽火车机车，牵引着6节煤车、20节挤满乘客的车厢，载重90吨，以时速15英里在达林敦和斯托顿之间完成了人类首次铁路运输。

铁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低廉、快捷的运输方式，征服了英国人。

英国的铁路里程以几何级数增长。

1838年，英国仅拥有500英里的铁路，到1850年发展到6600英里，到1870年发展到15500英里。一个星罗密布、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很快覆盖英国。

工程师富尔顿将蒸汽机运用于水上航行，建造了蒸汽轮船。富尔顿研制的“克莱蒙脱”号蒸汽船，在哈得孙河面以航速每小时4公里行驶了150英里，宣告了蒸汽轮船时代的到来。

在蒸汽轮船出现不到30年的时间里，英国人肯纳德就建立了4条从英国到美洲，横越大西洋的定期“海洋铁路”。

产业革命是一个连锁性反应的过程，技术革新在整个社会形成井喷式爆发。1770年，英国的煤产量是600万吨，钢铁产量是5万吨，到了1861年迅速上升到5700万吨和380万吨，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彻底转型。

英国工业革命的浪潮迅速波及整个欧洲，法国、德国紧随其后。1820年，法国仅拥有蒸汽机65台，到1869年增加到29000台。1832年，法国仅有一条全长39公里的里昂至圣艾蒂安铁路，到1869年铁路总长度已达17924公里。

1846年，德国蒸汽机动力总量仅为2万多匹马力，到1870年增至248万匹马力。1835年，德国仅有一条全长12公里的纽伦堡至费尔伯特的铁路，到1870年铁路总里程达到18876公里。

科技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这样评价工业革命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工业革命颠覆了世界文明的千年格局，完成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的位置互换，使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成为可能。

从文明的类型上看，东方文明源于大河流域，属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在人类早期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曾放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芒。但农耕文明守望田园、顺天应命、封闭保守的特质，到了近代便凸显落伍。

西方文明源于海洋，属海洋文明。海洋文明所蕴含的对外扩张、抗击天命、民主自由的特质，到了近代其优势日渐凸显。

进入近代之前，东西方文明在民主思想的酝酿与发展层面上，经历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发展过程。民主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涌现出梭伦、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著名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以希腊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研究国家管理事务，阐发民主思想，奠定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发展的基础。

罗马人又把古希腊的民主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创建了个人尊严、人人平等观念，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深刻地影响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发展走势。

近代伊始，席卷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使民主政治逐步摆脱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束缚，开始直面现实政治问题。马基雅维利、布丹等启蒙思想家的出现，使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思想进一步向世俗化迈进。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源于英国。13世纪初，英国形成了以召开议会来决定国家重大事宜的议会制度。议会由国王和贵族院组成的上院与由平民和新兴阶层组成的下院构成。1689年“光荣革命”后，英王接受《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体。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以责任制内阁为核心，国王仅仅是国家元首的象征，平常仅扮演仪式性的角色，实际上最高行政首长是首相。责任制内阁名义上对国王负责，实际上对议会负责。首相由议会多数党的领袖担任，手中握有行政权和立法创议权，成为事实上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影响了后来整个世界的政治体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英国的政治制度为参照建立起了各种政治体制。

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民主政治思想空前繁荣，出现了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这些启蒙